

移民・貧窮與政治經濟：印度德拉敦（Dehradun）的貧民區經驗

林郁雯

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三年級

摘要

本研究以印度城市德拉敦的貧民區家庭為主要的研究對象，透過民族誌的田野調查，了解貧民區的移民歷史，與其在城市落腳的生活面貌，與資本主義、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結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關鍵字：移民、貧窮、印度、政治經濟

「在倫敦，一個又一個工人階級的住宅區被中產階級入侵，當那些破舊的房舍租約期滿後，就搖身一變成了高雅而昂貴的大宅……士紳化/貴族化（*gentrification*）的過程一旦展開，就只有義無反顧地進行；而直至所有原居的工人階級居住者都流離失所後，整個社區面貌就徹底地改變了。」（修改自維基百科，2014；Ruth Glass, 1964）

一、城市的誕生

研究者的研究地點德拉敦，位於喜馬拉雅山山腳，屬於山谷地形，德拉敦在 2000 年成為北阿坎德邦（Uttarakhand）的首都後，短短十多年內迅速發展。許多自然地景因開發、建設，一去不復返，原先寧靜的谷地，搖身一變成為人車紛囂的城市，開發的腳步毫不停歇，持續擴張。家族世代在德拉敦生活者，提到德拉敦時總是說，以前開車的人少，車還沒開到你家前，光聽車聲就知道是什麼車、誰家的車。過去用手機的人少，哪一戶人家有手機，甚至是用什麼手機，大家（指德拉敦的居民）都知道。這些德拉敦人懷舊的話語，有幾分對於德拉敦快速發展後的感嘆，德拉敦在升格首都後，城市面貌有了快速的轉變。現今德拉敦在一些特地路段的房屋租賃價格，上漲至一般白領階級也無法負擔。通往市區內最高昂的住宅區路段，隨處可見的是預售的公寓式住宅廣告。德拉敦的人口結構在短時間內有了不小的改變，除了原居在德拉敦的市民，有追隨父母輩過去的腳步，從其他偏遠、貧困地區前來討生活，在貧民區落角的移民，近幾年來，也有嚮往便捷舒適都會生活，從其他地區搬遷至德拉敦的中、上階級移民，在新興路段大興土木蓋起豪華美舍，貧與富，先來後到，在新都會區裡落角。過去德拉敦家戶間能夠輕易辨識鄰里的生活景象，已不復在。

二、移民・貧窮與政治經濟

當代資本主義的進程中，全球有數以萬計的跨國界與跨城鄉的人口流動成為移工（夏曉鵬 2008）。印度雖為開發中國家，但在近二十年內經濟快速發展，也吸引鄰近貧困國家如尼泊爾等地的人民穿越國界，尋找工作機會。而在印度廣大的國土境內中，同樣也有龐大的鄉村人口，大量外移至都市，賺換取貨幣工資。研究者們探討這些離鄉背井的經驗，指出印度社會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，導致許多不平等，特別是原先在社經地位上便處於劣勢，缺乏教育、不識字的底層人民（Sen, 2013、Brody, 2009）。而印度的貧窮與不識字人口，主要是來自目前印度政府以法律認可為需要保障的弱勢族群，包含「設籍部落」¹、（Scheduled Tribes）、「設籍卡斯特」（Scheduled Castes）的達利人（過去稱賤

¹設籍部落者，也稱作 Advasis，意思是最早的居住者、居住在部落裡的人與土著的意思（轉引自：Cadena & Starn, 2007）

民)、「其他落後的階級」(Other Backward Castes)。是故，在了解印度底層人民時，必須要瞭解這些族群的境遇。

以印度原住民為例，Brody (2009) 的研究指出，印度獨立後，有許多是原住民被迫搬遷原居住地，流失屬於自己的土地，或是居住地域。在幫助印度政府發展諸多地區的重要推手則是，致力於「創造一個沒有貧困世界」的世界銀行(The World Bank)基金(依世界銀行官網宗旨，2014)，將原先的居住領域「發展」為礦山挖掘、水壩興建和重工廠，原居者失去農業以及以森林為基礎的經濟，生存維艱。世界銀行提供發展中國家貸款的國際金融機構，目的是促進外商投資，其官網頁首頁上，也有一目了然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債卷金額(Brody, 2009、The World Bank 2014)，然而這些龐大資金的運用，印度政府係以國家發展之名，正當化其剝削底層人民的國家治理。政府官員認為，在國家發展的前提下，部分人民的犧牲是必須的。同時也端出「利多」政策，在工業發展進程中，鼓勵大量的原住民部落人口離開原生地，從事「水壩，礦場和工廠」的工作，或者是季節性的提供到都市等發展地區工作，換取貨幣工資。印度政府宣稱，這些政策將可以透過物質，進而改善其生活和赤貧人生(Brody, 2009)。然而，實際情形是移工和其家庭所要面臨的，遠比政府素樸的提供就業機會的想法，來的複雜許多。當大量移民湧進都會區時，國家治理政策及不同階級社群在社會分工、城市空間劃分間的結構和階級關係之間的動力，都是移工與其家庭的艱困挑戰，以下筆者將討論在德拉敦與貧民區居民的訪談的經驗。

大量離鄉背井的移動人口往往面對著類似的困境：除了語言、生活適應與重建社會支持網絡等困難之外，他(她)們常常被拒絕一般移居地居民所享有的法律與社會 權益。事實上，他(她)們的存在時常被定義為國家必須以各種手段治理管制的移民／工「問題」。

(夏曉鵬, 2008)。

一位從事街童教育非營利組織工作，長期於德拉敦與貧民區家庭互動的阿優許表示，在筆者所關注的一個比哈爾邦(Bihar)人和旁遮普邦(Punjab)人的貧民社區中，旁遮普人以低廉的價格出租比哈爾人房間，但每天卻只願意提供兩小時的電力供比哈人使用，同時因為看不起比哈人進行資源回收或營造業的粗工職業，三不五時在比哈爾人經過其門前時，就對其言語暴力。阿優許轉述：「你們這些骯髒的比哈爾人，離我們遠點！」面對旁遮普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排擠，比哈爾人則因為在城市內找不到更廉價的房間可租賃，僅能默默吞忍。此例中顯示了即使同樣身為貧民區的住民，仍有階級的劃分，而身為地主的房東一方面要賺取比哈人的勞動工資，另一方面又要透過這群勞動階級，來突顯自身與其的高低差異。此外，阿優許，面對比哈爾人被長期霸凌的情形，態度有些不屑地表示：「旁遮普人排擠比哈爾人，但是依照我的經驗，比哈爾人辛苦工作，而且比旁遮普人更努力念書，更聰明。旁遮普人比較懶惰。」當阿優許談起她的想法時，言談中有對比哈爾人生活困苦的同情，和捍衛比哈爾人的正義感，然而在她拒絕接受旁遮普人的言論和霸凌時，同時也透露了主流社會經常有的價值觀念，辛勤工作值得讚許，反之則是懶惰、散漫，過度簡單的化約了族群的樣貌，和表達了刻板印象，同時也複製了旁遮普人將族群類別區分優劣的看待。此外，移民來到移居地，面對身分和權益的問題。印度以原出生地為歸屬進行

身分識別，隸屬甲地的證件，不能使用在乙地，如比哈爾邦人持哈爾邦證件，無法在德拉敦購地，不過若移民能夠出示在德拉敦長久居住的證明，如電費表單，便有機會能夠申請成為德拉敦人的身份證，但對上述描繪的貧民社區的比哈爾人來說，仍有實質的困難。如旁遮普人不願出示電費單予比哈爾人作為身分證明，旁遮普人表示擔心比哈爾人不當使用其電費文件。但是真正不願協助的緣故，很可能是該區把比哈爾人的電費繳納價格，係由地主說了算，若出示電費計價表，旁遮普人豈不是自討沒趣。當然，不協助的緣故也和其對比哈爾人的歧視有關。在身分證件上的困難，使一些希望留在德拉敦的移民，將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，當孩子在德拉敦出生和求學，未來使用孩子的身分證明，便能購地。移工在移居地的權益無法受到保障的另外一例是，印度來自貧困地區的住民通常都領有政府提供的配額卡（ration card），出示該卡，能夠以低於成本價格，向特定的政府合作商店購買食糧，但是該卡不能跨邦使用，研究者就發現貧民區的移民，自原居地購買大量食物帶回德拉敦囤積。配額卡的使用還有其他問題，例如有研究發現，一些偏遠地區領有配額卡的居民，必須到距離三小時車程的商店採買。另外關於這項印度政府以解除飢荒，用票卷換糧的救濟政策，也被批評為貧困者決定其需求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·森（Amartya Sen）與發展經濟學家（Jean Drèze）於 2013 年的研究認為，與其標記貧困者的需求，提供現金，讓貧困家庭自行運用調度，更能協助其改善家庭狀況。

比哈爾邦（Bihar），屬於印度最窮困的地區之一，不過在德拉敦，研究者接觸的比哈爾移民社群，在家鄉都有自己的房屋，非像前述原住民族群流失土地，流離失所。但同樣受到資本主義與經濟結構的嵌制，如農作物收成和租賃來的耕作土地的收支入不成正比，或者家鄉缺乏工作機會等緣故，必須往都會移動，這些移工的父母，早先也是到城市打拼，而這一代的青壯年，很多人跟隨父母的腳步，或在遠親近鄰的引介下，

城市的發展過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事營造業等勞動工作，因此許多偏遠貧困地區的青壯年，跟隨過去同樣是到都會區打拼的父母，或在遠親近鄰的引介下，先在家鄉結婚後，便帶著妻子，來到德拉敦，並落角貧民區討生活。從事吃重的、時有時無，不穩定的、「廉價的」勞動工作。一位住在貧民區，在家照顧五個孩子，同時兼任裁縫，27 歲充滿笑容，說話開朗的報導人卡朗說，她會來到德拉敦是因為婚後跟隨先生。選擇在德拉敦工作，純粹只是掙口飯吃，然後在飽足之餘，還能夠寄點錢回家給家鄉的父母。問起先生的工作時，她說先生從事粗工，也提到他近期的工作是將貨車運來的石土挑到一定點，薪資依每趟計算，一天能掙兩百盧比（約一百台幣，台幣比盧比，大約是一比二）。而裁縫工作的薪資也很微薄，在貧民區車縫一件沙麗的布邊，能掙二十盧比，但二手的裁縫機和腳踏座就要 3200 盧比，車線一捆成本也要 4 塊錢。這一戶人家租了大約兩坪大的一個小房間，簡單的鋁製悶燒鍋和廚具，就擺在房間內的地上。房間的租金是每月 900 盧比，盥洗則是到貧民區附近的公廁，包月要繳 200 盧比給清潔員。在開銷方面，卡朗表情和緩平淡地談到她的第一胎生產不順，孩子夭折，同時也有產後合併症，為了治療，她在家鄉借了 20000 盧比，在利息的壓力下，希望能盡快償還。但實際上卻因為時有額外的支出有困難，譬如她說最近的一胎，她選擇到貧民區附近的私立醫院生產（印度政府對貧民提供免費生產，與無償的疫苗注射，但若非在公立醫院生產，便無法施打免計價的疫苗），因為單天收取 1200 盧比，所以她待了一天就趕緊出院了。問她怎麼不到公立醫院生產，她說那裏的藥不合適她，她擔心過去的產後合併症復發。在訪談結束前，談到未來是否要定

居德拉敦時，身體半倚著房門外牆的她，一派輕鬆地說：「當小孩們在這完成他們的教育以後，我和先生會回比哈爾邦，如果孩子們喜歡這裡的話，他們可以留下。」

卡朗的鄰居拉納，談到家庭生活時就不如卡朗開朗。她表示婚前在比哈的生活很快樂，婚後隨丈夫來到德拉敦後，丈夫沉迷酒精，幾個孩子們教育經費和糊口的沉重的經濟壓力，就落在她的縫紉工作上。讓她更沮喪的是，家裡沒有任何一個決策，是她能夠作主的。

比哈爾邦的許多人，在不得不的情況下，從農業經濟，轉型投入勞動市場，為國家與資本家的利益，付出其生產力，以在自由競爭的資本市場中求生，但本來就缺乏競爭力的就業市場中，僅能從事薪資微薄的勞力工作，在印度的蓬勃經濟發展中，這些不可或缺，為國家付出最基礎建設的勞動者，卻沒有跟著國家的經濟成長，改善其貧窮的狀態，顯示的是國家在政治經濟結構中的控制與剝削。此外，受限於其識字能力等，貧民區的男性職業選項，多僅能固定在底層勞動力市場的貢獻與社會分工，其無法投入其他專業工作的職業中，也無法獲得社會威望與尊重，使得在能力無法施展的社會結構中，將有可以想像的沉重「無力感」。

三、結語

本文以民族誌方法，訪談德拉敦貧民區移民的家庭成員，與投入相關議題的非營利組織人員，從移工家庭的日常生活經驗，捕捉當代資本主義下，國際政治經濟決策（以世界銀行為例）、國家發展政策、貧窮政策等政治經濟結構因素，如何形塑德拉敦的移工浪潮。同時，當移民湧入有經濟優勢的城市討生活時，將面對哪些挑戰。

參考文獻

夏曉鵬

2008 跨界流離：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導讀。台北：唐山出版社

Bijoy, C. R.

2001 The Adivasis of India - A History of Discrimination, Conflict, and Resistance. Indigenous Affairs, 1(1), 54–61.

Brody, H.

2009 Scarificing People: Invasions of a Tribal Landscape. India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
Dreze, J. & Sen, A.

2013 An Uncertain Glory (pp. 183–185). Penguin Group, London, England.

Urban Dicionary

2006 Gentrification. Source: <http://www.urbandictionary.com/define.php?term=Gentrification>

The World Bank

2014 The World Bank. Source: <http://www.worldbank.org>